

壹、前言

大學教育是人才培育的重要階段，大學入學制度不僅決定高中教育的方向，也被視為社會資源分配的重要環節。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大學學歷和高中職以下學歷的勞工在薪資與工作穩定度上有明顯的差別（郭姿伶，2008；McCall, 2000; Paulsen, 1998）。因此，大學入學制度與大學教育機會分配的關係一直都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我國在2002年以包括「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學校「推薦甄選」與「個人申請」等管道的多元入學方案，取代實施長達48年的大學聯招制度。實施多元入學的目標，除了要讓各大學校系能夠招收到更為適才適所的學生外，還希望導正過去高中教學只注重升學考試的弊端，引導學生透過自我學習和課外活動經驗，發展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關係（秦夢群，2004）。可是，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來，常被貼上「多錢」入學的負面標籤。例如：某國立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曾經表示，推甄制度對窮苦弱勢的學生比較不利，主張保留較多的名額給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王彩鸞，2012a）。但是，這樣的印象真的符合實際的狀況嗎？本文要探討的問題之一，就是考試分發入學相較於多元入學的其他管道，是否真的比較不會受到考生家庭背景的影響？

至於本文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則是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所提供的垂直社會流動機會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由於這個問題必須比較不同入學管道和不同國家的入學制度所提供的垂直社會流動機會的高低，在無法進行跨國調查的限制下，針對個別大學的個案研究比較適合用來探討入學制度改變前後、或是同一時期透過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來源背景差異。本文將焦點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入學制度的演變，以及這三所大學學生來源集中於明星高中程度的分析。這三所大學長期以來一直是兩國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頂端，也是中上階層家庭和菁英階級積極爭取其子女進入就讀，藉以累積文化資本的首選志願。這些頂尖大學提供的社會流動機會雖然不同於整體的社會流動程度，卻最能真切反映不同的學校如何在追求卓越的同時，兼顧社會正義的目標。

貳、文獻探討

我國實施大學聯招近半個世紀，由於考試機會公開，評分與分發作業方式標準化，杜絕了人情關說的可能性，大學聯招形式上的「公平」獲得社會的支持（秦夢群，2004）。這種透過客觀標準來衡量個人學習努力與成就（考試成績的高低）並分配教育資源（大學入學機會），而不是根據種族、世襲身分、家庭經濟狀況來分配教育資源的作法，正是所謂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具體實踐。

在實證研究的文獻裡，已經有不少國內外的研究證實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背景對於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林俊瑩與黃毅志，2008；陳怡靖、陳蜜桃與黃毅志，2006；Coleman, 1988）。台灣的學生從國中畢業就根據基測成績分流，高中職畢業再用學測、指考或四技二專統測成績篩選進入大學，因此，家庭背景很可能從國中開始就影響了學生進入明星高中、普通高中或高職就讀的機會。陳怡靖等人（2006）研究「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波於2000年參加高中入學考試的高中樣本資料，結果發現，高社經背景的學生在多元入學中確實有較多機會透過聯考進入公立高中與直升私立名校，而且進入高中後的成績較佳。低社經背景的學生在聯考與直升中都居劣勢，不過，透過推甄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並不低於高社經背景的學生。陳怡靖與黃毅志（2011）進一步分析家庭背景對於高中不同管道入學機會的影響，結果發現，一般民眾質疑多元入學是多錢入學的指控，有失偏頗，因為在推甄、申請、登記分發和直升等多元入學管道中，只有直升入學會讓家境富裕的學生占優勢，其他三種管道則否。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在過去的聯考制度下，也有較高的機會進入公私立明星高中，卻很少聽到輿論批評聯考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關於我國大學入學制度公平性的研究，大多是討論學生家庭背景和入學方式的關聯性。駱明慶（2002）分析大學聯招時期（1982～2000年）的台大學生，結果發現，八成以上的台大學生來自明星高中，而外省籍、家長教育程度較高、居住在台北市和其他大城市的學生就讀台大的比例也愈高。張鈿富、葉連祺與張奕華（2005）比較新舊制多元入學方案（2001和2003學年度）入學的大學生，結果發現，儘管家庭收入還是影響就讀公立大學機會的重要因素，但低收入家庭學生在新制下卻有較高的機會進入公立大學就讀；新制的考試分發和申請入學管道進入公立大學的機會低於私立大學；新制的推薦甄選管道進入人文社會科系的機會高於科技